

學術論文

東亞國際秩序變化影響下的俄羅斯「東轉戰略」：主導觀念、制度安排與國際規範

Shift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and Its Influence on Russia's "Pivot to East": Leading Ide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International Norms

卡爾瑪耶娃 *Svetlana Garmaeva*

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Jilin University

徐博 *Xu Bo*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

Professor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Jilin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俄羅斯是當今國際體系中的重要大國，其對外政策是塑造國際秩序的重要因素。「東轉戰略」是 2014 年烏克蘭危機發生之後俄羅斯加快實施的重要國家戰略，也是一個包含了政治、經濟、外交多層次內容的綜合性戰略。在以往有關「東轉戰略」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關注對俄羅斯對外關係和國內政治對此戰略形成的影響。本文則著重研究東亞地區國際秩序對於俄羅斯「東轉戰略」的塑造。文章認為國際秩序主要由主導觀念，制

度安排和國際規範組成。近年來東亞國際秩序中主導觀念的變化表現為防禦性現實主義邏輯向進攻性現實主義邏輯演化，制度安排變化表現為美國主導同盟體系轉型以及新區域多邊合作制度出現，國際規範變化表現為氣候變化規範和政經合一規範的興起。這些要素的變化對於俄羅斯「東轉戰略」的發展將產生全面影響，俄羅斯的遠東開發戰略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其與東亞國家在能源、投資等領域合作模式也面臨轉型與升級。

Russia is an importan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Pivot to Eas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hat Russia has accelerated to implement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in 2014. It is als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hat include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content. In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Pivot to East", scholars have often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Russia's foreign relations and domestic politics on the formation of this strateg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haping of the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order for Russia's "Pivot to East".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s mainly composed of leading idea,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international norms. In recent years, the change of leading ideal in the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order is manifested in the evolution from defensive realist logic to offensive realist logic, the change i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s manifes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led alliance system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region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system, and th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norms is manifested i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of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nd interests. Changes of the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order will have a comprehens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s "Pivot to East" strategy.

關鍵詞：東亞、國際秩序、俄羅斯、「東轉戰略」、大國政治

Keywords: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Order, Russia, "Pivot to East", Great Power Politics

壹、前言

大國政治的變化是推進國際秩序演進以及國際體系變革的關鍵要素。俄羅斯作為當今國際體系中的重要大國，其對外交戰略和對外政策是塑造國際秩序的重要因素。「東轉戰略」(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Pivot to East) 是 2014 年烏克蘭危機發生之後俄羅斯加快實施的重要國家戰略。其直接戰略目標存在於兩個層面：一是在國際層面通過加強與亞太地區國家的高水準政治、安全合作來應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戰略擠壓。二是在國內層面，通過加快遠東地區的開發來提高俄羅斯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準。在此基礎之上，其最終戰略目標是通過實施「東轉戰略」來強化俄羅斯的全方位外交戰略，提高俄羅斯的經濟發展水準，鞏固俄羅斯在當今國際體系內的大國地位。

當前俄羅斯實施的「東轉戰略」是個包含了政治、經濟、外交多層次內容的綜合性戰略。自「東轉戰略」實施以來，俄羅斯與中國、印度、日本等諸多亞洲國家的合作得到了加強，取得了一系列十分顯著的外交成果。諸如中俄之間達成了一系列能源合作的協議，俄羅斯與日本持續開展有關簽訂和平條約的對話與磋商，俄羅斯與印度，越南等國家的雙邊關係也得到了鞏固。同時，普京政府通過在遠東地區設立「跨越式發展區」與舉辦「東方經濟論壇」等活動推動亞太地區國家在俄羅斯遠東的投資。普京政府將遠東開發視為「東轉戰略」的關鍵，不斷在聯邦政府層面出臺法律和法令，希望實現遠東地區的快速發展。可以說，「東轉戰略」已經成為影響東亞地區國際秩序演變的重要因素。

但與此同時，俄羅斯「東轉戰略」本身也體現國際秩序變化。烏克蘭危機的爆發是俄羅斯加快實施其「東轉戰略」的重要轉折。俄羅斯學者謝爾蓋·卡拉甘諾夫認為烏克蘭危機是現有冷戰後國際秩序在歐洲大陸失

調的重要表現。¹ 在最新版的《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中，普京政府認為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和經濟中的統治性地位正在不斷消退，國際政治-經濟的中心正在持續向亞太地區轉移，而俄羅斯則應當使面向亞太國家的合作和面向歐洲方向的合作互為補充。²而俄羅斯學者拉林（Victor Larin）則認為，21世紀國際秩序面臨的最重要變化就是全球權力體系正在由以西方為中心向以亞太地區為中心變遷。而俄羅斯的“東轉戰略則是”適應這一秩序變化的必要之舉。³

由此可見，俄羅斯的「東轉戰略」一方面是塑造今天國際體系的關鍵變數，其戰略的設計和實施正在塑造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新面貌，而另一方面「東轉戰略」本身又是國際秩序演變的重要表現，其發展進程深受國際秩序演變特點的影響。然而在現實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更加關注前者，也即「東轉戰略」對於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塑造作用，而對於後者，即東亞國際秩序本身變化對於「東轉戰略」的影響則往往不夠重視。在研究影響俄羅斯“東轉戰略”的具體要素時，現有的研究又基本關注雙邊層次或者國內政治層次，對於地區層次則很少涉及。因此，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將東亞地區的國際秩序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著重探討今天東亞地區所形成的國際秩序的新特點將如何影響俄羅斯「東轉戰略」的施行。在論文的第一部分我們將主要總結現有針對俄羅斯「東轉戰略」影響因素的研究並指出其中的不足。在第二部分我們將明確國際秩序的定義尤其是其組成要素。在第三部分我們將分析當今東亞地區國際秩序的主要特點以及新變化。而在第四部分我們將分析東亞地區國際秩序變化特點對於俄羅斯「東

¹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От поворота на Восток к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5 (2017), pp. 6-18.

² МИД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mid.ru/ru/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lCk6BZ29/content/id/2542248.

³ Виктор Ларин, “Нов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дл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аз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pp. 20-25.

轉戰略」的影響。

貳、現有研究及其不足

當前有關影響俄羅斯「東轉戰略」因素的研究從總體上看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外關係的影響，二是國內政治的影響。考慮到羅伯特·派特南（Robert Putnam）在對外政策研究中「雙層博弈」的理論設計，⁴ 這種分析框架總體上是準確和合理的。具體來看，現有的研究基本集中於以下領域：

一、對外關係的影響

在將對外關係視為影響俄羅斯「東轉戰略」的要素時，學者們一方面強調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惡化對於「東轉戰略」形成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則強調俄羅斯與中國關係的不斷加深促進了俄羅斯將更多的注意力轉向了東方。

首先，與西方關係的惡化被認為是促成俄羅斯「東轉戰略」的最根本原因。西方制裁造成了俄羅斯關鍵性企業融資困難，技術出口受到限制，資金外流嚴重。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需要加強與亞太地區國家的合作來彌補制裁帶來的經濟損失。⁵ 俄羅斯瓦爾代俱樂部專案主任巴爾達喬夫（Timofei Bordachev）認為，正是烏克蘭危機和西方制裁帶來了「東轉戰略」的加速。⁶ 莫斯科大學世界經濟系教授伊諾澤姆采夫（Vladislav Inozemtsev）則提出普京政府與西方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使得其

⁴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 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p. 427-460.

⁵ Вячеслав Холодков, "Санкции США и Евросоюза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http://riss.ru/analitics/6686/>.

⁶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ев: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и нов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мира",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ovorot-na-vostok-i-novaya-geopolitika-mira/>.

在烏克蘭危機之後不得不將中國視為更加可靠的合作夥伴。⁷英國查塔姆研究所的俄羅斯問題專家波波·羅（BoBo Lo）認為俄羅斯的「東轉戰略」並非是真的希望將其外交戰略的重點轉向亞洲，而更多的是一種策略性舉動，其意在通過加強與亞太地區，尤其是中國的聯繫向西方展現其不可動搖的大國地位，從而為未來和西方的博弈與談判獲得籌碼。⁸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一般認為俄羅斯的「東轉戰略」意在通過與亞太國家的經濟、政治合作來彌補其在對歐、對美關係中的損失。因此其合作的重點也必定多集中於實用主義的政治和經濟領域，一旦西方與俄羅斯的關係回到烏克蘭危機前的狀態，莫斯科的政治精英將不會進一步推進「東轉戰略」的實施。

其次，與中國關係的加強決定了俄羅斯「東轉戰略」中的基本合作方向。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俄羅斯看到了其遠東地區通過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來提高經濟發展水準的希望。尤其是全球政治經濟的變局為兩國帶來了合作的新契機。⁹而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計畫給中俄在遠東地區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和先決條件。¹⁰有俄羅斯學者指出，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亞太地區正在面臨著新的地緣政治變局，俄羅斯為了適應這一即將到來的地緣政治變局，需要推進遠東開發並加強與中國的關係，從而為保障自身在 21 世紀的大國地位奠定可靠基礎。¹¹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教授托洛拉亞（Georgy Toloraya）則認為俄羅斯應當在解決與西方關係的同時，積極構建與亞太

⁷ Vladislav Inozemtsev, "Russia Pivoted East Centuries Ago," *The Moscow Times*,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4/05/27/russia-pivoted-east-centuries-ago-a35879>

⁸ Lo Bobo, "Russia and the New World Disorder,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p. 179.

⁹ 石澤，〈俄羅斯東部開發—中俄合作的視角〉，《國際問題研究》，2017 年第 1 期，頁 24。

¹⁰ 劉清才，齊欣，〈「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遠東地區發展戰略對接與合作〉，《東北亞論壇》，2018 年第 2 期，頁 38。

¹¹ Хельге Блакисруд, Роман Вакульчук, Элана Уилсон Ров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о времен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pp. 14-18.

地區，尤其是中國的夥伴關係。¹²除此之外，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盧基揚諾夫（Fedor Lukyanov）也積極主張俄羅斯應當加強遠東地區的發展，與來自亞太地區的新興力量一起推動歐亞一體化的發展與形成。¹³

總體而言，針對對外關係的分析認為，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大幅倒退是刺激俄羅斯推行「東轉戰略」的最主要因素，而其與中國的關係特徵則決定了俄羅斯「東轉戰略」的主要合作方向。因此，能源開發、吸引投資以及政治安全合作是俄羅斯「東轉戰略」的主要實施領域，而這些領域互動也決定了俄羅斯「東轉戰略」成敗。

二、國內政治的影響

長期以來，相比於對外關係，關注俄羅斯國內政治對於俄羅斯「東轉戰略」影響的學者較少。這主要是由於俄羅斯不夠透明的決策機制以及政治精英內部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然而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俄羅斯「東轉戰略」的國內政治要素，並試圖分析這些要素如何塑造了「東轉戰略」的基本政策面貌。

當前有關國內政治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決策領域。福特斯庫（Stephen Fortescue）認為俄羅斯「東轉戰略」制定與實施的最大影響因素是俄羅斯內部政治精英之間的博弈，尤其是有關遠東地區發展模式的博弈。具有代表性的是前遠東發展部部長伊沙耶夫與特魯特涅夫在有關遠東發展模式上的爭議。伊沙耶夫更加注重以能源工業為基礎提高遠東的經濟發展水準，特魯特涅夫則強調通過吸引外來投資拉動遠東的經濟增長。而普京總統最終決定支援「特魯特涅夫模式」。這塑造了遠東開發的主要政

¹² Русская ДНК,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никак не может сделать выбор между Западом и Востоком,”(2016), https://lenta.ru/articles/2016/06/20/russian_dna/

¹³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Не потерять Евразию,”<http://eurasianews.md/analytics/ne-poteryat-evraziyu-fedor-lukyanov.htm>.

策特點。¹⁴ 俄羅斯學者阿爾焦姆·盧金 (Artyom Lukin) 認為這一模式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建立一攬子聯邦法律來加快改善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營商環境，從而吸引投資。他指出，2014 年以來俄羅斯已經出臺了 39 項聯邦法律和 167 項政府法令來提高遠東地區的經濟環境，包括建立跨越式發展區，貿易自由港和提高土地私有化來吸引更多外部投資。當然，他同時也承認當前俄羅斯政府有關遠東發展模式的決策並沒能從根本上改善俄遠東領土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遠東地區的生活品質仍遠低於俄羅斯的歐洲地區。¹⁵

與此不同的是，馬博認為雖然俄羅斯國內在遠東發展模式上存在爭議，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遠東地區最終的發展模式仍然是以能源經濟為主。¹⁶ 而俄羅斯學者帕諾娃 (Victoria Panova) 則認為當前的既有決策範式和政治結構限制了俄羅斯的政策選擇，俄羅斯如果想進一步推動「東轉戰略」的落地與實施，需要針對遠東地區的經濟潛力和發展水準制定全面的內部政策框架，從而加強遠東經濟的競爭性。¹⁷ 此外，也有部分學者如開始關注俄羅斯國內總體政治結構的影響。如徐博提出分析俄羅斯「東轉戰略」的國內政治框架，即戰略文化、央地關係以及政治結構對於「東轉戰略」實施的影響。而肖輝忠則遠東地方政府權力的缺失使得俄羅斯的遠東開發難以真正實現突破，帶動俄羅斯經濟的復興。

針對俄羅斯國內政治的研究更多關注普京時期俄羅斯國內的政權結構以及決策過程對於「東轉戰略」目標設定和實施的影響。這些學者的研

¹⁴ Fortescue, S.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A study in policy making," *Post-Soviet Affairs*, Vol.32, No.5,(2016), pp. 423–454.

¹⁵ Артем Лукин: "Азиатский разворот России пока не принес процветания Дальнему востоку",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aziatskiy-razvorot-rossii-ne-prines-prosvetaniya/>.

¹⁶ 馬博，〈俄羅斯「轉向東方」戰略評析—動機、願景與挑戰〉，《俄羅斯研究》，2017 年第 3 期，頁 49-73。

¹⁷ Виктория Панова, "Есть ли жизнь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est-li-zhizn-na-dalnem-vostoke/>.

究一般認為，正是俄羅斯國內政治的特點決定了「東轉戰略」的戰略規劃和實施效果。雖然對外關係會影響「東轉戰略」的總體方向，但其政策細節確是由國內政治決定的。因此，「雙層博弈」的模式同樣存在於俄羅斯的「東轉戰略」中。

總而言之，現有的相關研究基本仍是以結構-能動性（Structure-Agent）或雙層博弈（Two Level Game）理論邏輯為基礎，分析俄羅斯作為國際關係行為體對於體系刺激的反應以及國內政治對其政策特點的決定性作用。這種研究存在兩個缺點：一是忽略了地區層次作為一個關鍵的分析層次的作用，二是僅強調體系，而忽視了國際秩序作為一種帶有主觀色彩的宏觀因素對於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影響。而東轉戰略作為國際秩序轉型的反應以及其所指向的明確目標—東亞地區，均表明東亞地區國際秩序的變化特點將對於俄羅斯「東轉戰略」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而隨著東亞地區國際秩序進入到一個不穩定的變化時期，這種影響也將在未來表現得愈發明顯。

參、國際秩序的構成要素

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是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然而對於這一概念的核心定義，也即國際秩序由哪些要素組成，不同國家的國際關係學者則持有不同的態度。有關國際秩序的最初研究來自於赫德利·布林及其所代表的英國學派。在《無政府社會—國際政治中的秩序》一書中，布林提出了其對於國際秩序組成要素的經典劃分：共同利益、共同規則以及共同制度。在布林看來，國際秩序既是共同利益、行為規則以及共同制度三者觀念的結果。共同利益的觀念基於社會性的基本目標，行為規則的觀念基於支援這些目標，制度的觀念則有助於使規則有效率。¹⁸

¹⁸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 63.

與英國學派的觀點不同，美國大多數學者所持有的國際秩序觀則深受肯尼士·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的影響。沃爾茲強調權力的分配（Power Distribution）是影響體系結構的根本要素，也是塑造秩序的根源。¹⁹ 以基歐漢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及以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在承認權力根本性作用的基礎之上，又分別提出了制度以及身份要素對於秩序的關鍵性影響。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將美國不同學者的看法歸納為：現實主義認為秩序主要反映的是國家間實力結構的分配；自由主義者和建構主義者認為，衝突及其預防不僅由均勢來決定，而且也由相關國家的國內機構，國家的價值、身份、文化及跨國挑戰來決定；解決國際衝突的國際機構也有決定性作用。²⁰

除了英國學派以及美國學者的經典定義之外，實際上近年在來有關國際秩序的討論中正在產生一種折衷主義的定義。這種折衷主義的特點是一方面承認權力對於國際秩序形成的關鍵作用，但同時認為秩序帶有極強的主觀性質，是一種體系狀態的反應。例如亨利·基辛格在其所著的《世界秩序》一書中將國際秩序的根本要素歸結為兩點：一是明確被各國所接受的規則，二是規則受到破壞時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種均勢。²¹ 換一句話說，基辛格認為，合法性和權力是構成任何一種秩序的根本要素。無獨有偶，中國學者閻學通對於秩序的折衷主義定義闡述的更為深刻，他認為國際秩序主要包含三個要素：主導價值觀、國際規範以及制度安排。²² 其中維持秩序的主要手段是規範和制度。而規範和制度的界定則是源自於秩序內的主導價值觀。主導價值觀的變化決定了秩序內規範和制度的變化。而對於權力，閻學通則認為權力分配雖然是塑造國際秩序的基礎，卻不是國際秩序

¹⁹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p. 50.

²⁰ 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9), p. 276.

²¹ Henry A.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p. 15.

²²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Cambrid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85.

的組成要素。因為秩序是一種「具有主觀性」的事物。²³

以上三種有關國際秩序組成要素的不同理解之間的區別可以用下表來表示：

表 1 有關國際秩序三種定義的比較

定義	組成要素		
英國學派	共同利益	共同制度	共同規則
美國學者	權力分配	制度分配	觀念分配
折衷主義	主導觀念	制度安排	國際規範

圖片來源：作者自製

筆者在本文中所採取的有關國際秩序的定義更加接近於折衷主義的解釋。即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雖然是秩序形成的根本原因，但相對於秩序的主觀性，權力分配並不能構成秩序的組成要素。權力分配的直接結果是形成了秩序內的主導觀念，也即由體系內權力最大的一個或幾個國家（一般是霸權國家）為這個體系提供了根本性的行為邏輯。同時，圍繞著這個行為邏輯，體系會形成一系列的國際規範和制度安排。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國際規範和制度安排有時候並非完全服務於主導觀念，而更多是主導觀念的現實反映。其基本的變數關係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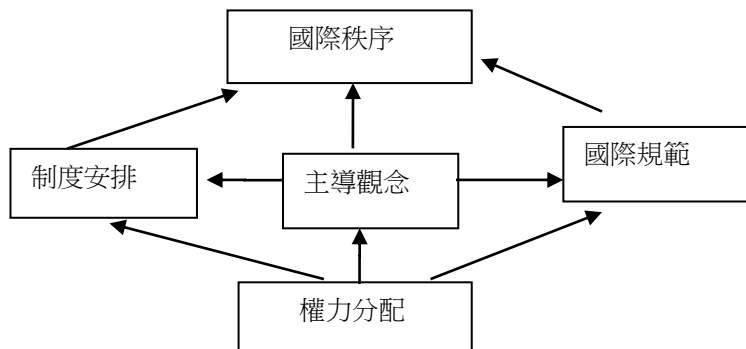


圖 1 國際秩序的折衷主義解釋邏輯

圖片來源：作者自製

²³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Cambrid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85.

在折衷主義視角下的國際秩序中，國際體系內的霸權國家或霸權國家集團為這個反映體系性質的秩序提供了主導型的觀念。其典型代表就是維也納體系下由神聖同盟所建立的以「歐洲協調」為主導觀念的歐洲地區國際秩序。在主導觀念的影響下，制度安排和國際規範得以產生。但同時，制度安排和國際規範受到權力分配的影響，又不僅僅是主導觀念結果，其中某些制度安全甚至有可能對主導觀念產生反向影響。這一點在發生權力轉移的地區體現得尤為明顯。如在維也納體系末期的歐洲地區，隨著權力轉移的產生，雖然其主導觀念仍然是大國協調，但制度安排已經由原有的神聖同盟轉變為三國協約和三國同盟。而國際規範則由以協調為主的規範轉變為以競爭為主的規範。

肆、東亞地區國際秩序的新變化

近年來，隨著東亞地區權力轉移的加速發展，尤其是中美之間權力格局的變化，加之國內政治的推動，使得東亞地區的國際秩序在主導觀念、制度安排乃至國際規範方面都在發生明顯的變化。這些新變化對於大國關係和地區安全局勢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具體而言，新變化主要發生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主導觀念方面，東亞地區秩序的主導觀念正在從防禦性現實主義邏輯轉變為進攻性現實主義邏輯。如前文所述，這一主導觀念的變化主要是由於體系內的霸主國家美國政策的變化而產生的。有關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的邏輯差別學者們有著不同的提法。根據唐世平的研究，進攻性現實主義與防禦性現實主義最大的差別對於權力是否等同于安全。²⁴防禦性現實主義認為權力不等同于安全，權力的擴大並不一定使

²⁴ Tang Shipi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s: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 50.

國家更加安全。而進攻性現實主義則認為權力越大則國家越安全。國際體系內權力最大的國家最安全。因此米爾斯海默提出「大國政治的悲劇」意即大國追求權力最大化過程中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衝突。²⁵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觀念變化產生於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尤其是自奧巴馬總統的第二任期開始，美國愈發明顯地將其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亞太再平衡」也因此成為奧巴馬政府東亞政策的標誌。然而與之後美國政府的亞太政策相比，「亞太再平衡」具有十分明顯的防禦性現實主義特點。也就是說，奧巴馬時期美國政府的東亞政策的核心目標在於維護美國的安全。對於中國的崛起其更多採取的是預防性的安全政策。²⁶然而自特朗普擔任總統開始，美國的東亞政策出現了明顯的轉向，美國將追求權力的最大化，而非安全最大化列為其東亞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美國的安全在這一時期實際上並沒受到明顯的損害，但美國的觀念卻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即認為安全不再等同於權力。由此帶來了主導觀念從防禦性現實主義到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轉變。特朗普「美國優先」實際上就是要追求美國權力的最大化。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影響下，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觀念表現得愈發明顯。

一般認為，拜登政府的上臺意味著「特朗普主義」的終結。但是在亞太政策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進攻型現實主義的邏輯在拜登政府治下實際上並沒有發生根本性逆轉，拜登總統曾明確提出其任內不允許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的頭號強國，²⁷這實際上就是特朗普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延續。同時，拜登政府無論是在同盟構建還是在對華經

²⁵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p. 89.

²⁶ "Advancing the Rebalance to Asian and the Pacific," *The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11/16/fact-sheet-advancing-rebalance-asia-and-pacific>.

²⁷ "Biden Says China will not surpass US as global leader on his watch," *MSN News*, <https://www.msn.com/en-in/news/newsindia/biden-says-china-will-not-surpass-us-as-global-leader-on-his-watch/>

濟政策上，都在極大程度上繼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基本政策框架，因此有人也將拜登的東亞政策稱之為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

受到主導觀念轉向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影響，實際上我們看到東亞地區各國都在被迫加強自己在這一秩序內的權力，尤其是安全領域的權力。近年來中國加強了在南海、尤其是臺灣海峽的防範措施，臺灣問題正在成為中美關係中的熱點問題。同時中國的武器研發以及海軍力量擴展也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日本近些年來不斷加快其所謂的正常國家化步伐，通過推動實際意義上的超越憲法<第九條>而擴大其在海外用兵的權力，同時通過加強與美國的合作，增強武器裝備的品質並開始部署諸如航母、隱身潛艇、海基高精度導彈等等武器。而韓國在朝鮮軍事威脅明顯減小的情況下，2019-2023 年軍費開支將達到創紀錄的 2400 億美元。而俄羅斯近年來也在加強太平洋艦隊的力量，加快部署超高音速武器，同時日益增加對於亞太地區安全局勢的關注。可以看出，東亞地區國際秩序受到美國主導觀念變化的影響，各國都在利用地區局勢的變化來增加自己在安全領域的權力，從而進一步推動了秩序主導觀念向進攻性現實主義邏輯轉變。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進攻性現實主義邏輯成為主導觀念卻並非意味著國家間的衝突已經不可避免。尤其是在 21 世紀的今天，大國之間核力量以及相互威懾的存在使得即使主導觀念已經具備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特點，但理性主義的行為模式和決策體系使得大國之間仍然具備很多溝通管道來比避免危機和衝突升級。

其次是在制度安排上，受到主導觀念影響的轉變，東亞地區國際秩序在制度安排上也出現了兩個新的變化：一是美國出於實踐進攻性現實主義思想的需要，加快推動亞太地區的同盟體系出現新變化。為了追求權力的最大化，美國正在抓緊在東亞地區打造新的同盟結構，也就是由原來的軸輻式同盟逐漸向網路式同盟轉變，其重點在於推進所謂 2+3+4 同盟網路。即美日-美韓 2 個雙邊同盟加上 AUKUS 機制（澳英美同盟）和 QUAD 機制（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從而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聯動太平洋與

印度洋、太平洋與大西洋的網路式同盟結構。²⁸未來甚至可能將這一複雜的同盟體系向北約化的方向進行推進。從而進一步加強對於中國的戰略優勢。

在制度安排上的第二個變化則反映出了東亞地區秩序的複雜性。雖然受到進攻性現實主義邏輯的影響，地區安全局勢開始出現相對緊張。但東亞地區國家處於規避進攻性現實主義風險的對沖需要，正在重新構建地區內的多邊合作網路。其典型代表就是 RCEP 和 CPTPP 的產生。兩者的產生實際上都與秩序觀念向進攻性現實主義轉型有著非常重要聯繫。即東亞地區內各國出於穩定的需要，在中日韓等區域內國家，尤其是中國在區域主導安全觀念轉型的背景下轉而相互妥協並在經濟合作領域達成協議，從而穩固地區局勢，對沖安全風險。

第三是在國際規範上，在主導觀念的影響下，東亞地區的國際觀念也在發生著兩個方向不同的變化。一是在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影響下，政經合一的原則正在取代政經分離的原則成為地區內大國交往的新規範。長期以來，政經分離的原則一直是東亞國家關係發展的主要規範，這主要體現在中日，中美，中韓關係中。即國家間的政治關係並不完全影響經濟合作。但近年來隨著進攻性現實主義日漸成為地區內的主導觀念，使得政經合一已經開始取代政經分離原則成為東亞主要地區力量的關係發展特點。美國不僅與中國在安全和意識形態上展開競爭，更是在經濟上對中國採取制裁手段，並建立 B3W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倡議，制衡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日本也對中國在高科技領域採取限制措施。未來這一趨勢很可能也會影響到韓國，澳大利亞乃至其他美國盟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

在國際規範上的第二個變化則是出於對沖風險的需要，以氣候變化合作為代表的新議題正在產生並可能成為地區內國家合作的新領域。²⁹中國

²⁸ “Why the AUKUS helps the QUAD,” *CISSAR*, <https://cissar.com/2021/10/26/why-the-aukus-helps-the-quad/>.

²⁹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limate change will reshape Russia,” *CISSAR*,

已經宣佈要在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美國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協定》並推進氣候合作；日本、韓國也出臺了碳中和政策；俄羅斯普京總統也在今年《國情諮文》中宣佈未來俄羅斯的碳排放總量要小於歐盟並計畫在年內出臺俄羅斯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戰略。³⁰ 氣候問題和綠色發展成為國際規範的主流對於各國的經濟發展合作以及東亞各國之間的能源合作將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有關碳關稅、碳足跡乃至低碳技術合作將成為未來東亞地區主要經濟體之間合作的重要內容。這在某種程度上將有助於政經合一風險的降低。

伍、東亞國際秩序變化對俄羅斯「東轉戰略」的影響

顯而易見，俄羅斯作為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支柱之一，其「東轉戰略」也將受到在東亞地區秩序中主導觀念，制度安排以及國際規範變化的影響。雖然在中俄美三角關係中，中俄關係明顯要好於中美關係和美俄關係，但主導觀念、制度安排以及國際規範所帶來的政治、經濟以及安全挑戰卻仍將從更長遠的角度帶給中俄關係以新的衝擊。同時也將影響到俄羅斯東轉戰略中諸如能源合作以及投資開發等方面的政策選擇。

首先，是隨著地區內主導觀念由防禦性現實主義邏輯轉向進攻性現實主義邏輯，俄羅斯在東亞地區面臨的安全風險正在增加。在進攻性現實主義邏輯的主導下，權力而非安全之爭將成為大國競爭的主要內容。這將造成俄羅斯周邊安全壓力的明顯上升。對於俄羅斯來說，地區主導觀念轉向進攻性現實主義首先意味著俄羅斯的遠東開發戰略會受到挑戰，進行區域合作的良好環境將受到影響。俄日關係以及朝核問題的僵持實際上並不利於俄羅斯推動其「東轉戰略」中對外經濟合作政策的實施。時至今日，俄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limate-change-will-reshape-russia>.

³⁰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1 April, 2021,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6794>.

羅斯國內投資仍然是俄遠東開發的主要資金來源，這實際上決定了俄羅斯遠東開發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同時，由於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安全部署的日漸加強，俄羅斯對於東亞地區的武器部署也必然隨之增加。2021 年 6 月，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歷史上首次在太平洋中部地區舉行演習，演習主要目標為消滅假想敵航母打擊群。其戰略威懾意圖極為明顯。此外，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將在未來幾年內接收 2 艘「北風之神」級和 2 艘「白蠟樹」級攻擊核潛艇並部署在勘察加潛艇基地。這 4 艘核潛艇的部署將極大增強太平洋艦隊的戰鬥力，也因此表明俄羅斯對於東亞地區安全形勢的擔憂。隨著中美戰略博弈日趨激烈，俄羅斯需要為東亞地區安全局勢的惡化做好相應的準備。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出於遏制中國的需要，在進攻性現實主義邏輯的指導下，會對於俄中關係實施所謂的「楔子戰略」。2021 年 8 月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庫普幹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離間中國和俄羅斯的正確道路》的文章，建議從 7 個方面瓦解中俄關係。³¹雖然其觀點受到了來自俄羅斯官方以及權威學者卡拉甘諾夫、盧基揚諾夫等人的反駁，但美國力圖穩固美俄關係，將戰略壓力全面轉向中國的意圖確是明顯的。俄羅斯普京總統也曾在聖彼德堡經濟論壇時在被問及如何看待中美貿易戰時提出「聰明的猴子坐山觀虎鬥」的表態，³²可以說，在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世界中，中俄關係面臨來自美國的主要挑戰恰恰不是共同的戰略壓力，而是美國的分化政策。

其次是在制度安排方面，如何應對地區內的安全、經濟合作制度轉型是俄羅斯必須面臨的問題。首先是美國同盟體系的變化。同盟體系的再構

³¹ Charles A. Kupchan, "The Right Way to Split China and Russia,"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8-04/right-way-split-china-and-russia>.

³² Nicole Hao, "Putin Says He Will Watch as US-China Trade War Unfolds," *The Epoch Times*,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putin-says-he-will-watch-as-us-china-trade-war-unfolds_2957850.html.

建是美國重建地區霸權的關鍵步驟。俄羅斯在東亞地區面臨的制度問題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共同防止東亞地區的安全格局的北約化。這裡的關鍵首先是保障朝鮮半島的穩定而防止韓國被美國拉入到多邊安全體系之中，然後則需要面對如何在四方安全對話建立後處理與印度的關係並繼續在中俄印三邊關係中佔據中間調節者的地位。印度作為俄羅斯長期的戰略協作夥伴對於俄羅斯維持在歐亞大陸的有利地位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近年來隨著中俄關係的加強以及中印關係的惡化，印度國內對於俄羅斯亞太戰略不滿的聲音日漸增加。雖然從短時間來看印度不會迅速加入美國的同盟體系，但俄羅斯如何在施行「東轉戰略」的同時繼續維持與印度的緊密合作關係則是莫斯科在推進「東轉戰略」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而在區域合作制度方面，俄羅斯「東進戰略」的主要挑戰是未來需要與新的區域合作制度實現對接，實現與 RCEP 和 CPTPP 的良性互動。俄羅斯如要實踐其大歐亞夥伴關係，則需要實現兩個方面的對接：一是俄羅斯遠東開發戰略與 RCEP 和 CPTPP 的對接，二是實現歐亞經濟聯盟與 RCEP 與 CPTPP 的互動。雖然當前俄羅斯與東亞地區主要國家的經濟交往主要集中在能源、金屬、化肥等等領域，且俄羅斯與東亞國家間並未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因此短時間內不會受到 RCEP 和 CPTPP 的衝擊，但隨著俄羅斯經濟發展模式需要向上游產業鏈轉移，其與 RCEP 和 CPTPP 的互動將不可避免。這將首先體現在農業領域，而後也將體現在 IT 技術以及高科技技術領域。由於農產品出口已經成為俄羅斯對亞太地區國家出口增長最快的領域，且 IT 和高科技行業是未來俄羅斯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向，因此在未來的「東轉戰略」中，俄羅斯必然對這兩個方向加以重點關注。

再次是在國際規範方面，氣候變化合作將成為俄羅斯「東轉戰略」的新方向。當前氣候變化合作已經成為中美俄之間可以開展共同對話的少數領域之一。同時有關綠色技術的競爭與合作也已經成為國家間關係的重要方面。如何通過氣候變化合作避免美國以及西歐利用技術優勢實現不對等

競爭是中國和俄羅斯共同關心的問題。³³尤其是在歐盟推出碳關稅政策的今天，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的中國和俄羅斯都需要針對在綠色發展的政策進行協調。這種政策協調對於全球氣候合作的推進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同時必須要指出的是，中俄兩國的能源合作必將受到氣候變化議題的影響。在中國宣佈實施碳中和的情況下，未來如何在保障中俄現有能源合作穩定的基礎上進一步開發清潔和可再生能源合作將成為中俄能源對話的重點領域。³⁴

就目前來看，俄羅斯的氣候政策已經出現了積極轉向。未來氣候變化規範將主要在兩個方面影響俄羅斯的東進戰略：一是在國內的能源開發領域，俄羅斯將施行更加嚴格的減排措施。俄羅斯政府已經規定 2025 年前每年排放 15 萬噸二氧化碳的公司和機構必須向監管機構報告其排放水準，而 2025 年之後每年排放 5 萬噸二氧化碳的公司和機構就必須公佈排放情況。³⁵而作為俄羅斯遠東能源開發基地的勘察加州已經宣佈將在 2025 年實現碳中和。因此，俄羅斯「東轉戰略」中的能源開發將面臨轉型。二是在對外能源合作方面，俄羅斯將更加注重非傳統能源，尤其是核能和氫能的合作。2021 年 5 月在田灣核電站和徐大堡核電站的開工儀式上，普京總統就強調俄羅斯與中國的清潔能源合作將助力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實現碳中和。同時普京政府在 2020 年 9 月通過了《2020-2024 俄羅斯氫能發展路線圖》，將氫能作為「資源創新發展的重要方向」，加緊氫能生產和運輸的佈局。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俄羅斯原子能集團和諾瓦泰克公司紛

³³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Игорь Макаров, “Поворот к природе,” *новая 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зеле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олитики*, Москва, p. 95.

³⁴ “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й развитие водородной энергетик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24 год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October, 2020.

³⁵ “Стратег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низким уровнем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до 2050 год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23 March, 2023.

紛出臺制氫專案。³⁶而氫能作為未來清潔能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有望成為中俄未來能源合作的新興領域。此外，由於俄羅斯在國際融資領域受到西方制裁的限制，因此其未來開展的氣候治理專案也需要來自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絲路基金的投資支持。而這也將為中俄兩國在「一帶一路」以及「一路一盟」多邊機制下的對接合作提供新的助力。

而在政經合一的規範方面，面對來自美國愈發長期化的技術制裁，中俄正在加強彼此在高科技領域的務實合作，尤其是在半導體、人工智慧以及高科技產品研發方面。目前，俄羅斯將發展人工智慧作為高科技領域發展的主要方向，2019年10月俄羅斯政府通過了2030年前發展人工智慧的國家戰略，隨著西方國家對於俄羅斯制裁的有增無減，俄羅斯在高科技領域的融資將越來越傾向於與中國等亞太地區國家進行合作。俄羅斯具有應對西方技術封鎖的經驗和高水準的研發團隊，而中國的資金和市場則可以為兩國的共同研發提供保障。中俄在東亞地區政經合一規範日趨明顯的情況下，進一步深化兩國的經濟合作水準對於保障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發展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此外，俄羅斯也在積極開展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高水準科技合作，包括與印度開展布拉莫斯導彈的聯合生產研發，2021年俄羅斯與菲律賓簽署了出售海岸防禦系統的協定，此外俄羅斯與越南等國家也在開展合作研發和生產。隨著世界範圍內高科技競爭的日趨激烈以及政經合一規範的日趨明顯，俄羅斯的「東進戰略」也必然更加重視在這些領域的對內發展和對外合作。

陸、結 論

俄羅斯作為東亞國際體系中的重要大國，其「東轉戰略」自實施以來，

³⁶ “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й развитие водородной энергетик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24 год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October, 2020.

對東亞地區的國際關係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東轉戰略」一方面加快了俄羅斯國內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經濟發展步伐，另一方面則加快了歐亞地緣政治的聯動性，使得中俄關係進入到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然而，「東轉戰略」作為塑造東亞地區國際關係格局的重要影響因素，其本身發展也必然受到東亞地區國際秩序的變遷的影響。

在以往的有關影響俄羅斯「東轉戰略」因素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更加重視俄羅斯對外關係以及國內政治的刺激作用。這種研究一是忽略了地區層次作為一個關鍵的分析層次的作用，二是忽視了國際秩序作為一種宏觀因素對於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影響。因此，筆者在研究中將分析物件設定為東亞地區國際秩序，著重分析近年來東亞國際秩序特點及其對俄羅斯東轉戰略的影響。

在有關國際秩序的定義方面，筆者採用的是折衷主義的定義，即國際秩序的主要組成要素是以權力分配為基礎的主導觀念，制度安排和國際規範的結合。而在東亞地區，這些要素出現的變現表現為：主導觀念由防禦性現實主義的邏輯正在進化為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邏輯；制度安排出現了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轉型以及以 RCEP 和 CPTPP 為代表的新的區域合作機制，國際規範則表現為氣候變化和政經合一新規範的崛起。

東亞國家秩序的新變化給俄羅斯的「東轉戰略」帶來了全方位的影響。主導觀念的變化使得俄羅斯的遠東開發面臨更大挑戰，而俄羅斯也在通過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實力來鞏固自己在這一地區的安全；制度安排的變化使得俄羅斯與印度的關係面臨風險，同時未來俄羅斯的經濟發展也面臨與新區域合作機制對接的問題。氣候變化規範的興起將極大影響俄羅斯的國內能源開發和與亞太國家的能源合作，同時政經合一規範的興起將迫使俄羅斯在加快高科技開發的同時，加強與中國等國家在高科技領域的合作。

本文希望通過此項研究，將東亞地區國際秩序轉變為影響俄羅斯「東

轉戰略」的引數而非因變數。在歐亞地緣政治高度互動的今天，東亞地區的國際秩序的變遷已經成為影響未來俄羅斯「東轉戰略」走向的關鍵因素。對於這一秩序內部因素演化特點的理解，將為我們揭示俄羅斯「東轉戰略」的變化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責任編輯：吳家綺